

汉熹平石经经数考订

周佳羽

扬州大学文学院, 江苏 扬州 225002

摘要: 熹平石经的经数问题历来存在五经、六经、七经之说, 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之间的矛盾暗含经学范畴的动态演变。本文通过考辨《后汉书》《隋书·经籍志》等文献的记载差异, 结合王国维、吕振端等学者的研究及民国出土残碑的实证, 指出经数分歧的本质在于不同时代对“经”之政治与学术功能的差异化界定。研究表明: 五经说是东汉政治正统的象征性建构, 六经说源于学术实践对《公羊传》的务实纳入, 七经说则是隋唐以来经目扩张与科举制度结合的产物。经数的流变揭示了“经”并非凝固文本, 而是随政治需求与学术潮流不断重构的知识载体。

关键词: 熹平石经; 经数争议; 经学

DOI:10.64649/yh.shygl.2025010010

1. 引言

熹平四年蔡邕书丹, 使工镌刻, 于光和六年竣工, 使石立于太学门外, 此为汉石经, 又名熹平石经、一字石经等。关于熹平石经的刊刻原因在史书中多有记载, 例如:

《后汉书·宦者吕强传》云: 时宦者汝阳李巡, 以为诸博士试甲乙科, 争第高下, 更相告言; 至有行赂定兰臺漆书经字, 以合其私文者。^[1]

《后汉书·蔡邕传》: 邕以经籍去圣久远, 文字多谬, 俗儒穿凿, 疑误后学。^[1]

由此可见, 汉灵帝刊刻石经的直接动因是当时诸博士参加甲乙科试, 为了平息争端将固定的课本刊刻于石经之上, 公诸于世, 取信于天下儒生。如此一来便达到预期“五经一定, 争者用息”的效果了。从学术史的角度再度回望, 其刊刻的根本原因在于: 统一经学的时代需求。例如吕振端所说: “汉初承秦火之后, 群经传授, 章句已多歧义。东汉以还, 益复醇疵杂糅, 众说纷纭。”^[2], 东汉经学在经历焚书禁学的浩劫之后, 今古文之争与师法、家法分歧使经学体系亟待规范化, 而朝廷为巩固统治, 亦需统合学术思想。

熹平石经的经数问题历来争议颇多, 涉及五经、六经、七经三种说法。正史记载不一: 《后汉书·灵帝纪》《儒林传》等称“五经”, 而《蔡邕传》《张驯传》则作“六经”; 《隋书·经籍志》更进一步记为“七经”。近代出土残石证实其内容囊括《周易》《尚书》《诗经》《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 似为“七经”定讞。

本文试图追问: 同一石经的经数为何在历史长河中呈现出五经、六经、七经差异? 其背后不仅是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不相符的事实, 更是不同时代对“经”的范畴不同划分标准,

旨在透过经数之争的表象窥见经学在学术与政治的拉扯下的流动性本质: 不仅是凝固的权威文本, 更是随政治需求与学术潮流而不断变化的知识载体。

2. 文献记载的经数分歧

熹平石经共刻有《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五经, 《公羊传》《论语》二种, 但对于其经数的记载并非单一且固定, 在不同的史料中存在不同的说法。

2.1 一是五经说, 例如:

《后汉纪》云: 熹平四年春三月, 五经文字刻石立于太学之前。^{[4](P463)}

《后汉书·灵帝纪》云: 熹平四年, 春三月, 诏诸儒正五经文字, 刻石立于太学门外。^[1]

《后汉书·卢植传》云: 时始立太学石经, 以正五经文字。^{[1](P615)}

《后汉书·儒林传序》云: 灵帝诏诸儒正定五经。^{[1](P747)}

《魏书·江氏传》云: 陈留、蔡邕采李斯、曹喜之法, 为古今杂形, 诏於太学立石碑刊载五经题书楷法。^[5]

《水经注》云: 东汉灵帝光和六年, 刻石镂碑载五经立于太学讲堂前。^[6]

由此可见汉代的《后汉书》多云熹平石经所刻经数为五经, 比《后汉书》晚成书的《魏书》、《水经注》皆承袭其经数为五的说法。

2.2 二是六经说, 例如:

《后汉书·蔡邕传》云: 奏求正定六经文字, 灵帝许之, 邕乃自书册丹於碑, 使工镌刻, 立于太学门外。^{[1](P575)}

《后汉书·张驯传》云: (张驯) 与蔡邕共奏定六经文字, 擢拜侍中, 典领秘书近署。^{[1](P750)}

以上文献俱云熹平石经所刻经数为六经。

2.3 三是七经说, 例如:

《隋书·经籍志》云: 一字石经《周易》一卷, 一字石经《尚书》六卷, 一字石经《鲁诗》六卷, 一字石经《仪礼》九卷, 一字石经《春秋》一卷, 一字石经《公羊传》九卷, 一字石经《论语》一卷, ……又后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 皆蔡邕所书。^[7]

王国维《魏石经考一》云: 然则以碑数与经文字数互校, 汉石经经数, 当为《易》、《书》、《诗》、《礼》(原注: 仪礼)、《春秋》五经, 并《公羊》《论语》二传, 故汉时谓之“五经”, 或谓“六经”, 《隋志》谓之“七经”。^[8]

以上文献俱云熹平石经所刻经数为七经。

据后世出土实物考证, 汉石经共存在七种文本已成定论, 但以上定论并不能否定五经、六经之说的合理性, 也不能成为七经之说正确性判断的“免死金牌”, 因为文献记载是一种历史书写, 其“书”与“不书”, 言“五经”、“六经”或是“七经”是具有时代选择性的, 而非单纯记数, 每种说法都是特定时代下的产物, 因此出土实物应该是作为证据去佐证前人说法的真伪, 从而尽可能还原历史的真相, 若是通过出土实物的考证便对前人文献记载的说法一票否决, 实属本末倒置。

3. 五经、六经、七经之说的合理性建构

据上文可做出以下判断: 汉时云熹平石经为五经或六经, 隋唐以降皆云熹平石经为七经。对于熹平石经经数争议的本质是不同历史语境下对“经”之范畴的重新定义, 五经、六经、七经的合理性并非相互排斥, 而是各自根植于政治话语权、学术实践需求的务实调整与后世诠释的层累建构, 因此关于不同经数的合理性建构关键在于将不同的经数之说放置于特定时代背景下。

3.1 五经说: 政治正统的象征性建构

《白虎通义》云: 经所以有五何? 经, 常也。有五常之道, 故曰五经。……五经何谓? 谓《易》《尚书》《诗》《礼》《春秋》也。^[9] 其作为东汉官方意识形态文献, 明确提出“五经”概念, 并将其与“五常之道”绑定, 构建出“三纲五常”的政治体系, 以维护皇权正统。汉灵帝诏令刻立熹平石经时强调“正定五经”, 实为重申“五经说”的权威性, 以平息党锢之祸后的士人质疑。《后汉书》坚持“五经说”, 实为权力话语对历史书写的规训, 使其成为士人课试的唯一标准。然而, 实际刻石内容涵盖七种文本, 却在

官方表述中仍称“五经”。这一矛盾表明, “五经”并非严格数目, 而是政治符号——其外延虽因教学需求扩大, 但核心仍以“五”为象征, 凸显朝廷对经学解释权的绝对控制。明确地说: “五经”是政治符号, 非严格数目。

3.2 六经说: 学术实践的务实性突破

六经说见于《后汉书》之《蔡邕传》、《张驯传》, 据文献记载刊刻熹平石经时, 蔡邕、张驯二人皆官至议郎, 为“明经”察举的典型代表。据《汉官仪》记载: “举明经, 迁议郎”“明经质直, 宜备近臣, 为议郎”^[10], 在汉代成为议郎的前提为通过“明经”, 需要对儒家经典有深入的理解和掌握。议郎虽非高位, 却属皇帝近臣, 负责顾问应对, 参与朝廷的议论与决策, 兼具儒生和官员的双重身份, 这种特殊的政治与学术地位, 使其既能洞察经学教育之弊, 又握有推动改进的部分话语权。

东汉今文经学因师法、家法之争日益僵化, 面临古文经学的挑战。作为儒生和议郎, 蔡邕等人意识到固守“五经”模式已难满足现实需求: 《春秋》若无《公羊传》则义理晦涩。为应对学术困境并平衡今古文之争, 二人突破官方“五经”范式, 提出将《公羊传》纳入经学体系的六经说, 既解决教学难题, 又强化今文经学的解释权。

3.3 七经: 后世诠释的层累性建构

首先, 《隋书·经籍志》称“汉镌刻七经著于石碑”, 是在六经的基础上将《论语》由“传”入“经”。此说实为魏晋南北朝经学扩张的投射, 魏、晋以后无论是《公羊传》抑或是《论语》并称为经。据文献可考, 唐代经学与唐代举贡制度息息相关, 据文献记载:

《通典·选举典》卷十五载: “大唐贡士之法, 其常贡之科有秀才、有明经、有进士、有明法、有书、有算。自是氏族所趣向, 唯明经、进士二科而已。”“明经所试一大经及《孝经》、《论语》、《尔雅》, 帖各有差”。^[11]

唐代贡举科目众多, 唯明经、进士二科为士林所重, 明经考试的具体内容为一大经加之《孝经》、《论语》、《尔雅》这三门必考经典。因此唐代学者“以今释古”, 以当时的观念反推汉代, 由此熹平石经为七经的说法开始流行。

其次, 近代以来, 学者以出土残石为据, 将“七经”视为实证结论。王国维用数字统计的方法, 以碑数与经文字数互校, 认为文献中对汉石经的记载“经数莫确于《隋志》, 石数莫确于《洛阳记》”并考汉石经经数当为《易》、《书》、《诗》、《仪礼》、《春秋》、《公羊传》、《论语》7种。^[12] 罗振玉循王国维之研究路数, 通过对出土残碑进行考证, 认为王国维对于熹

平石经为七经之说法无误。但是通过实证所考据出的七经说需要区分“刻石内容”与“经目范畴”，并不能以现代学科范畴切割古代知识体系，从而忽视“经”的流动性特点。

总括而言：五经说是东汉时期政治话语权的象征，六经说是学术实践的务实性突破结果，七经说是后世对前代的重新诠释。经数的扩大揭示出“经”的流动性本质：它即是凝固的权威，亦是流动的知识。

4. 经数争议之下的经目扩充事实之原由

熹平石经经数的争议反映了经学在时代变迁中的动态调整。从汉代五经、六经到隋唐七经，经目扩充是政治需求与教育实践交互作用的结果，呈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政治权力对学术的控制是关键动因。东汉为统一意识形态，将五经与五常绑定，通过《白虎通义》确立“经者，常也”的体系，使五经成为政治符号。六经说则因《公羊传》的大一统理论符合政治需求而出现。隋唐科举制确立后，为适应选官需要，增加《论语》《孝经》形成七经体系，使经学与官僚制度深度结合。

教育实践需求同样推动经目演变。东汉为规范教材而刊刻五经石碑；《公羊传》升格因其能辅助理解《春秋》；隋唐时《论语》因科举考试需要被提升为经。这种调整既满足教学需求，又强化了经学的实用功能。

熹平石经经数的变化本质是经学对时代需求的回应：汉代五经是皇权象征，六经是学术突破；隋唐七经则是科举制度的产物。近代考古发现七经文本，使七经说成为主流观点。对于熹平石经经数的争议绝非单纯的数目分歧，它本质上体现出的是“经”的流动性本质，唯有回归历史语境，才能理清出土实物与文献记载之间产生矛盾的原因，从而还原“经数之争”的真实逻辑。

5. 结语

熹平石经的经数争议，表面上是文献记载与出土实物之间的矛盾，实则深刻揭示了“经”范畴的动态性与历史建构性。本文研究表明：“五经说”并非误记，而是东汉政治正统的象征性建构。在《白虎通义》确立的“五经”对应“五常”的官方意识形态框架下，“五经”作为皇权与学术正统的标志，其核心功能在于平息争端、统一思想，其外延虽因实际教学需求有所扩展，但在官方表述中仍被严格限定为“五”，体现了政治话语对经学解释权的绝对控制。“六经说”源于学术实践的务实突破。以蔡邕、张驯为代

表的议郎群体，兼具儒生与近臣身份，深谙经学教育的困境与今古文之争的压力。他们在奏请和实施刻经时，突破官方“五经”范式，将《公羊传》纳入核心体系，形成“六经”说，反映了经学体系为应对现实需求而进行的内部调适。

“七经说”是后世经目扩张与诠释层累的产物。《隋书·经籍志》的记载，将《论语》由“传”正式提升为“经”，反映了魏晋南北朝至隋唐经学范畴的扩展趋势。唐代科举制度更强化了这种“以今释古”的诠释模式，使“七经”成为回溯汉代石经的主流认知。近代考古发现虽证实了石刻有七种文本，但将此等同于汉代“七经”概念，则忽略了“经”在不同时代的特定内涵。

因此，熹平石经的经数分歧，其本质在于不同历史语境下对“经”之政治功能与学术边界的不同界定。五经、六经、七经之说并非简单的孰是孰非，而是各自根植于特定时代的政治诉求、学术实践与后世诠释之中。这一争议清晰地昭示：“经”并非凝固不变的文本集合，而是随政治需求变迁、学术潮流涌动而不断被重构的知识载体与权力象征。对熹平石经经数的考订，其意义不仅在于澄清史实，更在于透过“数”的表象，洞察经学在权威凝固与知识流动之间永恒的辩证张力，理解“经”作为中华文明核心典籍，其生命力正源于这种在历史长河中不断被赋予新义的动态本质。

参考文献：

- [1] 范晔. 后汉书 [M]. 北京：中华书局，2007.
- [2] 吕振端. 汉石经论语残字集证 [M]. 雪兰莪潮州八邑会馆学术出版基金，1975.
- [3] 陈立. 白虎通疏证 [M]. 中华书局，1994.
- [4] 袁宏. 后汉纪 [M]. 中华书局，2002年.
- [5] 魏收. 魏书 [M]. 中华书局，1974年.
- [6] 酈道元. 水经注 [M]. 中华书局，2020年.
- [7] 魏征. 隋书 [M]. 中华书局，1973.
- [8] 王国维. 王国维文存 [M]. 江苏人民出版社，2013.
- [9] 班固. 白虎通义 [M]. 中华书局，2024年.
- [10] 刘攽. 汉官仪 [M]. 宋绍兴临安府刻本.
- [11] 杜佑. 通典 [M]. 中华书局，1988.
- [12] 赵立伟. 论罗振玉对汉石经的整理与研究 [J]. 淮阴师范学院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0, 32(03): 338-341+370.

作者简介：周佳羽（2001.04—），女，汉族，四川成都人，扬州大学文学院中国古典文献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